

导 言

“古今中西”是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所谓古今，指的是历史学的研究内容从以古代史为主转向以现当代历史为主 与之相伴 人们的历史观也从将古代社会看做黄金时代的复古论转向进化论，这为最终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所谓中西 指的是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 从鄙弃西学 到师夷长技 再到但求富强、不问中西 无疑是个进步 而对“夷”长技的不同认识 更是反映出人们思想的逐渐深入。从史学史的角度看 西学在中国的兴起过程 也就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取代封建旧史学的过程。

清朝乾嘉时代的史学思想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以往的学者多以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摧残了史学的生命，导致乾嘉史学只余下史考和史补之类的东西，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此时的中国史学也正在寻找着自身的突破方向。那些被称为乾嘉考据学者的文章里，蕴涵着许多丰富的史学思想 如赵翼、戴震等人虽以考史见称 他们的史学思想同样也很丰富。尤其是章学诚《文史通义》 更是封建史学的集大成之作 此书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 提出了

许多新的想法，代表了此时史学开始向求新与求变的方向发展。^{〔1〕}而乾嘉时期今文经学的复兴，为此后人们认识社会、研究史学提供了思想武器，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蓬勃发展。正当中国史学求新、求变之际，鸦片战争爆发了。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惊醒了大清朝野的帝国迷梦，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其先进的武器，逼迫清政府签订下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人们根本不了解世界局势，面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以往的考据学自然毫无办法，刚刚兴起的经世之学积极应对，但却无法提供解救之道，传统的以中国历史为鉴的史学思想已无能为力！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将眼光从中国历史投向世界历史，于是有《海国图志》等书的编写与出版。尽管这样的考察还比较肤浅，但即使是如此肤浅的考察也足以让人大吃一惊，此时的西方已远非想像中的夷狄，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中国在武器上不如外夷的事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应运而生。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外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传播，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封建旧史学不过是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无法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为

〔1〕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十章《史学求变和文史通义》，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307页。

此他们呼吁进行史界革命，倡导撰写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民史，而梁启超在这一运动中的贡献尤为巨大。由于资产阶级新史学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以今文经学为指导的封建旧史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公羊三世说为历史进化论所代替，大同理想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虽然这一过程比较缓慢，其间也有一些反复，如辛亥革命失败后史学领域里的尊孔复古思想，代表了封建旧史学的回潮，但从总体上看，资产阶级新史学正在逐渐成长。

晚清史学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 19 世纪 90 年代正是两个阶段的分界线。第一个阶段的史学家们发扬今文经学里的历史变易思想、公羊三世说、经世致用等学说，主张对外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对内进行变法改革，他们的这些主张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第二个阶段的史学家们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开始尝试用西方的学术思想分析和研究历史及现实情况，猛烈批判了封建旧史学的种种弊病，积极提倡资产阶级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得到迅猛发展，中国历史学逐渐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晚清是一承上启下的社会，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晚清的史学思想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传统史学思想又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围，对于此后的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历史本体的认识问题逐渐深入，历史变易思想成为晚清史家的共识，进化史观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中国传统史学里本来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变易思想，随着社会的剧变，近代的史学家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思想里的历史变易思想的价

值 发展了历史变易思想并进而赋予其以新的内涵。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虽然也说过“变化之为言 天道也”〔1〕之类的话语，但这只是借阐释经义的方式，含蓄地论证了历史的变易性。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后，人们认识到从前以为不变的天地其实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龚自珍、魏源明确指出自然界里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三代以上 天皆不同今日之天 地皆不同今日之地 人皆不同今日之人 物皆不同今日之物”。〔2〕人们只有积极地顺应这种变化，才能够治理好国家。这以后 王韬说：“今而知地球之永 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 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 将坏之一千年 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 其所谓世界者 约略不过万年 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 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 则世变不极 地球不毁 人类不亡。”〔3〕王韬知道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分子 像地球似的行星几如恒河沙数 地球、人类都有各自产生、生长、灭亡的周期。从这种认识出发 他以为人类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他说：“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4〕郑观应则认为历史的这种变易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他说：“是知物极则变 变久则通。虽以圣继

〔1〕 庄存与：《系辞传论》第 5 页，《味经斋遗书》光绪八年重刊本。

〔2〕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47 页。

〔3〕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202～203 页。

〔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第 13 页。

圣而兴 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 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1〕 风尚所趋，就连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王先谦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变易性。他说：“自古天下风无不变 亦无变而不能正者。”〔2〕 严复亦根据他所学习到的西学知识，以为天地都在变化之中。他说：“夫 疑为天 始于涅槃 今成椭圆 天枢渐徙，斗分岁增 今曰逊古日之热 古暑较今暑为短 天果不变乎 炎洲群岛 乃古大洲沉没之山尖 萨哈喇广漠 乃古大海浮露之新地 江河外啮 火山内壖 百年之间 陵谷已易 眼前指点 则勃（似应为渤）海旧界 乃在丁沽 地果不变乎？”〔3〕 梁启超宣称：“凡在天地之间者 莫不变……上下千岁 无时不变 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4〕 唐才常则依据西方天文、地质学的知识 认为‘地运之日变一日 日新一日’，〔5〕 他并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理论，指出自然界是按照由低级向高级再到人类社会的规律进化 他说：“地球之生 由流质而定质 由定质而凹者海、凸者陆 由凹凸而大草大木大鸟大兽 由大草大木大鸟大兽而猕猴 由猕猴而野番部落 而打牲游牧 而人世界 而多

〔1〕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66 页。

〔2〕 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四《四书文龠序》，《葵园四种》（梅季标点本），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第 55 页。

〔3〕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0 页。

〔4〕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1 页。

〔5〕 唐才常：《通种说》，《唐才常集》卷一（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103 页。

君 而一君。”〔1〕 因此，历史变易思想在晚清事实上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历史既然在变，那么它是怎样变化的呢？晚清史学家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由于受到公羊三世说思想的影响，近代早期史学家的历史观多表现为朴素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搀的特点。庄存与最早运用公羊三世说理论 将人类历史分成上古、中古和后世三个阶段，一方面承认历史向前发展 但另一方面他又讲“治乱相循”〔2〕“文质再复”〔3〕表现出朴素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搀的特点 刘逢禄、宋翔凤亦是如此。龚自珍以为人类的整个历史可以分成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个阶段 每世之中还可以再分成三世 逐渐向前发展。魏源将人类历史分成太古、中古和末世三个阶段，末世之后便返回到太古时期，如此循环往复。王韬从君民关系的角度出发 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代以上 那时“君与民近而世治”第二个阶段是从秦始皇开始“废封建而为郡县”尊君卑臣 君民之间等级森严；第三个阶段为“君主于上 民主于下”〔4〕 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尚未出现 但英国的制度却与此相近。王韬的这种分法 实际上是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民主制、君主专制和现代民主制度三个时期。郑观应以为“世界由‘弋猎’变为‘耕牧’再变为‘格致’是

〔1〕 唐才常：《辨惑上》，《唐才常集》卷一 第166页。

〔2〕 庄存与：《系辞传论》第95页，《味经斋遗书》本。

〔3〕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第1页，《味经斋遗书》本。

〔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第23~24页。

“世运之迁移 而大地自然之理也”。〔1〕历史只会进步而不会退步“;时至今日 断无反诸过去制度也”。〔2〕黄遵宪认为 中国历史可分为封建之世和郡县之世 如果此时能“以公理求公法” 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改革 则“可以追共和之郅治 臻大同之盛轨” 这便是历史的“大势”所在。〔3〕康有为也以为世界的发展 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 最后必将“进化至大同”。〔4〕作为在中国最早系统传播进化论的第一人,严复以为 人类社会的进化始于图腾社会 经过游牧社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 最终进入国家、军国社会 的。严复还比较了中西历史观念的不同 他说:“中之人好古而忽今 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 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5〕梁启超则明确指出历史是遵循进化的公理:“自达尔文出 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 皆循进化之公理 日趋于文

〔1〕 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郑观应集》上册 第 481 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三《致翦淞阁主人书》,《郑观应集》下册 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40 页。

〔3〕 黄遵宪:《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225~1227 页。对此的专门论述 可参看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第三篇的有关论述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23~124 页。

〔4〕 康有为:《礼运注》,《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239 页。

〔5〕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 第 1 页。

明。”〔1〕他并认为历史学应以进化论为指导“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唐才常一方面赞同人类社会是按照“由简而繁 由粗而精 由蛮野而文明”〔3〕的方式发展的进化论,一方面又批评了“荣古”“尊古”的论调 赞同西人“一切政学格致,皆谓今胜于古”〔4〕的主张。历史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对学习西方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古代的中国人错误地以为天圆地方 中国居于大地的中央 因此是“中国”是华夏 其他小国居于四周 故为“四夷”。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认识到大地为一球形,无所谓中央与边缘 中国不过是世界各国之一。所谓夷夏之说 纯粹是中国人的错误看法。鸦片战争前后 林则徐、魏源等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认识到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外“夷”的事实 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5〕的主张 号召学习外国的“长技”。他们虽然延袭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华夷观念,但却没有鄙弃外“夷”的意味。魏源在《海国图志》里借他人之口 反对将外国人称为夷狄 书中指出 夷狄之称“专指残虐性情之民”而现在“远客之中 有明礼行义 上通天象 下察地理 旁彻物情 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

〔1〕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6 第 114 页。

〔2〕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9 第 10 页。

〔3〕 唐才常:《通种说》,《唐才常集》卷一 第 104 页。

〔4〕 唐才常:《辨惑上》,《唐才常集》卷一 第 166 页。

〔5〕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陈华等人点校注释本《海国图志》 岳麓书社 1998 年版 第 1 页。

奇士 域外之良友 尚可称之曰夷狄乎？”〔1〕西方不仅不是什么夷狄，而且还有可供中国学习的长技。郑观应根据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指出：“夫地球圆体 既无东西 何有中边 同居覆载之中 奚必强分夷夏？”〔2〕因而他主张不分什么夷夏之别。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王先谦也号召学习西学 他认为 西学不过是形而下的工艺之学 而中学则是形而上的求道之学 西学源自中国古代 只不过自汉以后“中国缺焉弗讲而已”现在学习西学 正是“天将使中国圣教行于西土 西土艺术还之中国 亦宇宙自然之气运也”。〔3〕王先谦的这种西学中源说充满了夜郎自大的心理 尚不如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论平实 但在当时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影响。严复继承了郑观应的思想 明确指出 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起来 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 新学还是旧学 不管其来自中国还是外国 都应该学习“不暇问其中若西也 不必计其新若故也”即使其“出于夷狄禽兽 犹将师之 等而上焉者 无论已。何则 神州之陆沉 沉 诚可哀 而四万万之沦胥 甚可痛也”。〔4〕唐才常则以为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文明“夷狄者 野蛮土番之记号 中国者 礼仪文明之记号”。如果此时还将西方列强称为夷人“庸詎知我夷彼 而彼已三等土番 我也”。〔5〕谭嗣同的观点与此相近 针对时人以中国骄人、以夷

〔1〕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六《国地总论下》第 1888~1889 页。

〔2〕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 第 67 页。

〔3〕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二《与俞中丞》，《葵园四种》第 895 页。

〔4〕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 第 560 页。

〔5〕唐才常：《辨惑上》，《唐才常集》卷一 第 167 页。

狄诋人的错误 谭嗣同指出 地是圆的 无所谓中外 而《春秋》之言夷狄 并非以地域和种族 而是以教化文明作为分别“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何如耳”。〔1〕正是由于西学的传入，人们才得以改变了对于外国的错误看法。

中国人对于西方长技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的。在魏源等人看来 西方的长技其实不过是坚船利炮等先进技术 这种认识为当时许多人所赞同。而王韬由于对西方了解较多，他看到西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制度 那种把船坚炮利、工商发达当做英国立国之本而不是君主立宪政体的看法是浮浅的、错误的。康有为说：“泰西之强 不在军兵炮械之末 而在其士人之学 新法之书。”〔2〕严复亦以为西方的富强有其学理的一面，“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3〕而其学术皆源于“实测”可用之于实际生活中。中国要想富强，只有学习西学，采用西洋之术培养人才。应该指出的是 严复的这种说法与洋务派的主张不同 洋务派所主张的中本西末论及中体西用论强调的是以中学作为根本 是在维持中国封建秩序的基础上学习外国 严复则以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 西学有西学之体用 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

〔1〕 谭嗣同：《南学会讲义·论学者不当骄人》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401 页。

〔2〕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583 页。

〔3〕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 第 23 页。

之 斯其文义违舛 固已名之不可言矣 乌望言之而可行乎!”〔1〕
严复主张不分体用，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不论是来自中学还是西学的方法都可以采纳，“不暇问其中若西也”。〔2〕

其三，为了更好地经世致用，学者们逐渐从以古为鉴转到合中西之古以为鉴。中国古代史学强调以古为鉴，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治理国家提供借鉴。鸦片战争之后，人们认识到仅能读中国历代正史、编年、纪传之类历史 充其量只能是“通古史”而能读《东华录》、《圣武记》之类史书 可谓“通今史”。除了通知古今以外 还必须能读魏源《海国图志》、梁廷枏《海国四说》、徐继畲《瀛环志略》、王韬《普法战纪》及《法国志略》、黄遵宪《日本国志》、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以及外国人撰写的《万国史记》、《欧洲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 如此可称得上是“通西史”。而在当时的中国 不能只取鉴于中国历史 还必须“合中西之古以为鉴”。正如唐才常于 1897 年所指出的那样：“要之 考古以证今 由中以逮西 博观而约采 规时而达用 之四者，史学之宗旨也。”〔3〕这便是说，史学研究的宗旨在于：考古的目的是为了通今，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能转到研究西方的历史 博览群史的目的是为了“约采”而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应为规时而达用——即能为现实服务。

通过阅读世界历史著作，人们认识到：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 由于学习西方而富强 亚洲、非洲一些国家因墨守成规、不思

〔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 第 559 页。

〔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 第 560 页。

〔3〕 唐才常：《史学论略》，《唐才常集》卷一 第 40~41 页。

变法而亡国。这一正一反两样结局，成为当时人们经常谈论的经验和教训。比较起来，当时的人们更重视亡国的历史。他们以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1〕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取鉴于亡国的史学思潮。为此，历史学家们编译了大量亡国史著，如1902年丁文江翻译的《亚细亚西南部衰亡史》、1903年《杭州白话报》上连载的《世界亡国小史》、1911年殷鉴社编辑的《近世亡国史》等，均表现出浓厚的取鉴于亡国的史学思想。〔2〕

其四，从史学研究的内容上看，人们逐渐认识到封建旧史学的弊病，转而提倡资产阶级新史学。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先后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他们认为以往的史学所记载的不过是君王个人的历史，不是广大人民的历史。黄遵宪以他的实际行动率先倡导“民史”的编撰。他在《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著作里记载下日本的风俗民情，成为新史学的实践者。康有为指出，以往的史学只是“一君之史，一国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但历史不应只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3〕而存在，而应为民众所存在，因此他主张历史应如实谱写民俗，使后人了解“教化”的盛衰，从中获得教益。梁启超进而

〔1〕《新民丛报》1902年第6号对于《埃及近世史》的介绍。

〔2〕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3〕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五，《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763～764页。

以为中国的传统史学“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1〕“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2〕唐才常则以为西方的报馆即史馆，在议院开会的时候，王公大臣与议员们讨论国家事务，“无论事之大小，各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语无忌讳，言多实录，视中国之史书为尤足信”。在他看来，这表明“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3〕言下之意是说中国只有君史而无民史。1903年，严复在有关译著中批评以往史书只记载帝王的生活，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却不予记载，“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之所关，虽大而不录”。〔4〕这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学，实际上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5〕

其五，从晚清史学著作的编纂体例上看，章节体逐渐成为史书编写的主要体例。何秋涛《朔方备乘》一书除采用了传统史学里的纪事本末体、纪传体之外，还有考证性质的论文及图说。梁廷枏《海国四说》既采用了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同时又受西人著作的影响，有些地方采用了章节体的编写方法，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再穿插进有关政治、地理、经济内容，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编写外国通史的先例。王韬《法国志略》对于传统史书的编撰体例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在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同时，吸收了纪传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 第60页。

〔2〕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第1集，1898年长沙初版。

〔3〕 唐才常：《唐才常集》卷一《史学论略》第41～42页。

〔4〕 严复译：《群学肆言·驳愚第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8页。

〔5〕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一册 第34页。

体等编撰方法的长处。黄遵宪《日本国志》采用的则是典制体的写法，并以自注对于史实加以考证、补充和分析。这里要特别指出夏曾佑（1863～1924年）对于史书编写体例的巨大贡献。1902年，夏曾佑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历史教科书，1906年，《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此书的体例采用的是西方流行的章节体，共分二篇四章一百七十节，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同类事件。这种编写体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史学编撰方法的不足，使得读者能更好地看出各历史事件间的联系。由于这种体例具有这些优点，所以很快便取代了其他方法，成为此后史书编写的主要方法。不过，我们在肯定这种体例的创造性的同时，也应看出其与中国传统史书编写体例间的关系。正如当时该书的广告上所说的那样：“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1〕而已。除夏曾佑以外，其他学者也曾尝试过新的历史编撰方法。如章太炎于1900年所作《中国通史略例》里提出编写通史的体例构想，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类配合记载中国历史。〔2〕他们的这些设想，反映了近代史学家们寻找史书编撰体例的努力。

其六，晚清史学研究的方法表现出求新与多样的特点。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方法以考据为主。梁启超以为，这种治学方法可分为四步：第一步，留心观察事物，找出其中的特殊之点；第二步，找出相似的其他内容加以研究；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提

〔1〕《东方杂志》第三卷第七期，1905年7月出版。

〔2〕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331页。

出自己的意见 第四步 证实此意见。他并以为这种考据方法颇合乎科学精神 实际上也就是归纳法。^{〔1〕}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论的指导,人们的思维尚不够十分严谨,这种局面直到严复时方有所改变。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逻辑学知识的学者,他认为,从逻辑上看,我国以往的学问多偏重于演绎法 却不善于归纳法。他说:“吾国向来为学 偏于外籀 而内籀能事极微。”^{〔2〕}为此 他在介绍归纳法和演绎法 他称之为内籀法、外籀法 的时候 重点介绍了归纳法。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实验对于认识事物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测内籀之学”^{〔3〕}(即经验归纳法)总结出的结论才能成为公例。所谓实测 就是像西方学者那样 在研究中以实际观察所得和实验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 层累阶级 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 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4〕}而内籀之学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 而后可存”^{〔5〕}严复介绍的治学方法 对于当时的史学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比较起来,王国维 1877~1927 年 对于史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更大。王国维以为:“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

〔1〕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51 页。

〔2〕 严复:《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五册 第 1243 页。

〔3〕 严复:《天演论》论十一《学派》按语,《严复集》第五册 第 1385 页。

〔4〕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 第 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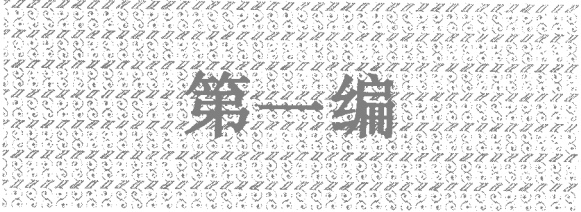
〔5〕 严复:《民约平议》,《严复集》第二册 第 337 页。

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 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 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主张以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来证明历史文献记载的真伪 从思想渊源上看 乾嘉考据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实证论对其影响显而易见。王国维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史取得很大成绩 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堪称是典范之作。

五四运动前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科学的治史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并逐渐成为此后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是近代前期，即 1840～1919 年的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也将其称为晚清史学思想。由于史学思想的延续性，本书所涉时间范围有所扩大 上限从常州今文经学派的产生写起 以弄清晚清史学思想的源头 下限截止于 1919 年五四运动，有些史学家虽然去世于 1919 年以后，但因其思想及影响主要发生在此之前，故亦放在这一时期里论述。相反，对于那些影响主要在近代后期的史学家 虽然前期也有一定影响 如章太炎等人 则不在此期里专门论述。

〔1〕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 页。



第一编